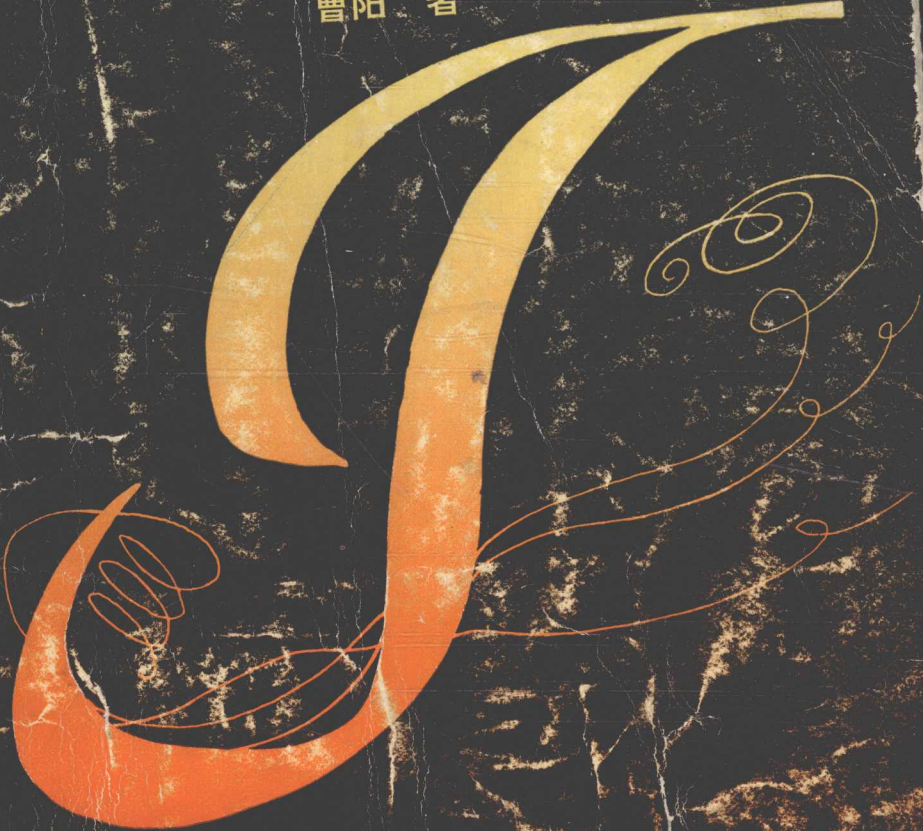


曹阳 著



历史的选择

——市场经济发展史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的选择

——市场经济发展史

曹 阳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历史的选择

——市场经济发展史

曹 阳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师大桂子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95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22-1199-X/F·67

印数 1-2000

定价 5.5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自然经济冻土里崛起	
——市场降临人间	(4)
1·1 “静悄悄的革命”:市场的萌芽	(4)
1·2 商品、市场,人类社会经济史“火”的发现	(7)
1·3 可怕的幽灵:自然经济的掘墓者	(11)
第二章 戴着枷锁跳舞	
——国家管制的市场经济	(19)
2·1 商人与国王联姻,权宜之计的“神圣同盟”	(19)
2·2 商人的眼光,“货币是唯一财富”的幻觉	(21)
2·3 外贸管制,国家之间的封建割据	(23)
2·4 官商和国家管制:扭曲了的市场机制	(25)
第三章 斯密的呐喊	
——解放市场	(29)
3·1 《国富论》: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	(29)
3·2 自然秩序,对人为秩序的抗争	(33)
3·3 国富的要旨,分工、交换、“经济人”、自由竞争	(36)
3·4 “看不见的手”,无政府状态,还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	(41)
3·5 “自由放任”,有为的“无为而治”	(44)

第四章 神奇的法术

——市场经济的力量 (50)

- 4·1 地底下冒出来的巨大财富;市场经济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50)
- 4·2 开放的洪流,相继倒塌的自然经济藩篱 (55)
- 4·3 都市文明;挡不住的诱惑 (61)
- 4·4 “制度创新”;现代经济增长之“谜” (65)

第五章 市场经济并非伊甸园

——风险、波动与危机 (72)

- 5·1 “优胜劣汰”;“有人上天堂,有人下地狱” (72)
- 5·2 周期循环与波动;一道解不开的结 (77)
- 5·3 可怕的1929—1932;谁之罪! ? (81)

第六章 矫正市场

——凯恩斯革命 (86)

- 6·1 古典传统的叛逆者;向“萨伊定律”的挑战 (86)
- 6·2 国家干预;让“看得见的手”补充“看不见的手” (91)

第七章 市场和国家的再定位

——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 (97)

- 7·1 “停滞膨胀”;凯恩斯理论的危机 (97)
- 7·2 众矢之的;国家侵蚀市场 (100)
- 7·3 “国家迷信”;国家权力膨胀的根源 (104)

第八章 “来自竞争的繁荣”

——原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120)

- 8·1 货币改革;从“统制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市场 (110)
- 8·2 “社会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 (116)
- 8·3 国家;“足球裁判员” (120)

第九章 日本“奇迹”的奥秘

- 东亚市场经济模式 (126)
- 9.1 日本“奇迹”，高速增长的轨迹 (126)
- 9.2 高速增长的“时代精神”，日本的传统加美国文化 (129)
- 9.3 “政府”与“企业”，“船长”与“罗盘” (134)

第十章 理论的误区

-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 (138)
- 10.1 矫枉过正的批判：计划取代市场的构想 (138)
- 10.2 失败后的反思：“新经济政策”的可贵探索 (142)
- 10.3 斯大林的判词：“外壳论”“限制论”“异类论” (146)

第十一章 实践的歧途

- 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154)
- 11.1 集权式计划化：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家迷信” (154)
- 11.2 “短缺经济”：微观经济的低效率 (161)
- 11.3 “计划失衡”：宏观配置的大浪费 (165)

第十二章 艰难的探索

- 找回市场的改革呼声 (172)
- 12.1 “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早探索 (172)
- 12.2 自治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第一个实践背叛者 (176)
- 12.3 重新发现市场：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探索 (181)

第十三章 滚动的春雷

- 中华大地的“第二次革命” (188)
- 13.1 打破坚冰：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88)
- 13.2 饥饿逼出来的改革：市场机制引发的农村发展奇迹 (192)
- 13.3 “再造几个香港”：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 (197)

13·4	艰难的攻坚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202)
------	-----------------------	-------

第十四章 鹿死谁手？

——	双重经济体制的并存	(209)
----	-----------------	-------

14·1	“真空”、摩擦与混乱：双重体制的“无序”与“混沌”	(209)
------	---------------------------------	-------

14·2	罪责在谁：“改革过头”还是“改革不足”！?	(215)
------	-----------------------------	-------

14·3	“双轨合一”：合向何方?	(219)
------	--------------------	-------

第十五章 走向未来

——	社会主义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	(223)
----	---------------------	-------

15·1	三个“有利于”：从姓“社”姓“资”的困惑中解脱出来	(223)
------	---------------------------------	-------

15·2	走向未来：社会主义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	(226)
------	--------------------------	-------

前 言

市场经济，这个黑色的幽灵，几年以前，还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拒之于“社会主义”大门之外。相当长一段时期，市场经济被描绘成利欲横流、弱肉强食，无政府无秩序的妖魔鬼怪。然而，正是这一“妖魔”，曾启动了现代西方社会的高速经济增长。“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也是这一“妖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促成了东亚“四小龙”的起飞。谁能料想地不足14000平方公里，人不足8000万的南韩、香港、新加坡、台湾这一弹丸之地竟能够创造出出口几百亿美元的经济奇迹？事实说明，有着古希腊文明和地中海文化传统的西方人能凭借市场经济走向富裕；同样，被泱泱中华文化所复盖、所影响的东方人也能够凭借市场经济步入繁荣。

中国是东方一条曾沉睡数千年的巨龙。东方的繁荣，最终将仰赖于中国的繁荣。不庸讳言，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泱泱中华大国在近代已被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无情地抛进了后进国家之列。它蒙受了贫穷、落后、“东亚病夫”的羞辱。为使中国重新崛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批又一批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引导时代前进的先进中国人曾为之前仆后继，不懈地探索与追求。40多年前，经过无数的坎坷、挫折与流血牺牲，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之

时,亿万苍生为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再生热泪盈眶。为了自己共和国的建设,中国人民倾注了高度的热忱。他们节衣缩食、风餐露宿、肩扛手推、艰苦创业。他们的脚下,一条条新的铁轨在延伸;他们的双手,把一片片戈壁荒滩变成了新的工厂、新的油田。中国有了自己的汽车、自己的飞机、自己的原子弹……。与过去相比,新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不再是“白纸”一张,它有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中国还没有摆脱贫穷。从整体看,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处于世界后列;从局部看,1979年以前老、少、边地区有几千万农民兄弟还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当那些吸着民脂民膏、自己不愁衣食住行而高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左”派理论家在大力讨伐市场经济,大谈“富变修”的时候,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正乘着市场经济的东风,经济扶摇直上。所幸的是,“福兮祸所倚”,“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终于使中国人民惊醒。当邓小平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简单、朴素,而在当时又是惊世骇俗的真理之时,中华大地正在滚动着第二次革命的春雷。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最终选择市场经济的革命,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注入了走向富裕和繁荣的新活力。如果说我们曾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最大的错误则在于排斥了市场经济。排斥市场经济的后果是经济体制的日渐僵化和呆滞,短缺、浪费、效率低下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之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究其实就是市场导向的革命。“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②陈腐的对市场经济的偏见已被活生生的市场经济现实击得粉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正在通过自己伟大的实践,重新认识市场经济。

注 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6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 ②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一章 自然经济冻土里崛起 ——市场降临人间

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恩格斯

§ 1.1 “静悄悄的革命”：市场的萌芽

革命，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字眼，但革命并不一定就是急风暴雨似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当启动人类社会经济史重大革命的商品、市场结伴降临时，既没有鲜花铺地的颂扬，也没有义愤填膺的斥责，更没有姓“社”姓“资”的论辩。它们静悄悄地降临人间，一切都是如此平静，如此自然。

有商品就必然有市场；有市场也必然有商品。正如列宁所说：“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赞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却要打倒市场经济。

的确，市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并不是与人类同时诞生的。自人类脱离动物界开始，大概在一两百万年的漫长时期里，人们并不知道商品、市场为何物。在那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如此恶劣，野兽、洪水肆虐，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如此低下，使用的是石头、木棒等极其简单粗糙的工具。在这种条件下，单个人、少数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自卫和谋生。“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②因而，氏族的成员只有统为一体，共同自卫，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维持人类的繁衍、生存。如果有人想多吃一点，别人就有可能饿死，劳动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没有剩余产品，人们两手空空，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用之交换的东西。

随着社会生产力极其缓慢的发展，原始社会终于出现了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农业部落专门生产粮食、瓜果，畜牧业部落专门生产肉类、毛皮。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在满足了最低生存的基础上，人类进一步追求多样化的生活需要，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农业部落的成员不但需要吃粮，也需要变换口味吃一吃肉。现代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消费同一物品越多，其边际效用越是递减，用通俗的话说，“吃多了也就吃腻了”。口味的变换，事实上也是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同理，畜牧业部落的成员也需要变换口味吃一吃粮。人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以自己有的去换自己没有的（“以所有易其所无”），以自己善于生产的去换自己不善于生产的（“以所工易其所拙”），是一种对己有利（同时对入也有利）的行为。《淮南子·齐俗》中有如下记载：“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人，用宜其人，泽臬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于是，交易双方既有交换的意愿，也有交换的条件，商品就此出现，市场也就此诞生。

交换、商品和市场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人类追求更高生活质量、追求多样化生活需要的产物。不停倦地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使人成为更完善、更自由的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市场，^③说到底，只是人类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工具。

最初的商品交换并不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是在原始公有

制的基础上开始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原始公社的边界上开始的，而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开始的。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③原始氏族公社的首领或代表把自己氏族共同生产的剩余产品在公社边缘的地方与另一氏族公社首领或代表带来的剩余产品交换。这些用来进行交换的产品一开始都是氏族公社的公有产品，很显然，通过交换得来的产品也必然要作为公有产品归整个氏族公社共同消费和占用。据我国的古籍《尚书·大传》记载，舜曾“贩于顿丘”。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舜的所谓“贩”，就是指舜代表自己的氏族部落去与别的氏族部落进行产品交换。这里的产品非舜一人私有的产品，而是舜所代表的氏族的公有产品。

从现在的眼光看，商品交换与市场一开始就碰上了公有与私有这一对矛盾。氏族公社用来交换的产品无疑是公有的产品，这个最原始市场中的双方交易主体无疑都是公有制单位。由此可见，商品交换与市场并不要求微观经济主体一定要是私有制单位。但是，这里的公有决不是单一的全民所有。每一个氏族公社都有着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的氏族公社之间“彼此当作外人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又是“私有”的。不过，这个“私有”是针对氏族公社外部而言的。即使是氏族公社之间的公有产品交换，在市场中，他们都必须是独立的、平等的、产权明确并能自由处置自己产品的经济“个体”（或称“私有体”）。由此看来，“公有”与“私有”不也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吗！？

不管后来的人们如何评说，商品交换与市场适应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已静悄悄地来到了人间。我们迄今还未发现原始人反抗、诅咒商品交换与市场的史料，这或许可证明它们的产生在最初受到了人类普遍的欢迎，至少人们并不讨厌，因为它们的出现毕竟增

进了人类的福利。然而，静悄悄地来临的“革命者”也毕竟是“革命者”。它首先炸毁了原始公有制，促成了私有制的诞生；尔后，它向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传统发起了不停顿的、顽强的冲击，最终把自然经济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同时，它还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一系列重大的变革。

§ 1.2 商品、市场：

人类社会经济史“火”的发现

在人类的历史上，“火”的发现被誉之为人类进化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上，商品、市场的出现可与“火”的发现相媲美。

商品交换和市场促进了原始公有制的解体，催生了私有制，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故事。原是在氏族公社边界上进行的商品交换逐步侵入到了氏族公社内部。首先是氏族公社的首领开始占有一部分交换得来的产品，成为最初的私有财产；随后是公社的其它成员也逐步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私有产品交换，私有财产进一步普遍化。原先氏族公社作为一个整体只是与其它氏族公社“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现在公社内部各成员之间也逐步“彼此当作外人看待”。原始公有制的丧钟敲响了。

原始公有制解体，私有制取而代之。开始是劳动产品成为个人财产，接着是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也逐步变为个人财产，再接着是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个人财产，奴隶出现了，奴隶制度产生了。

商品与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平等的交易主体、等价的交换是市场经济运转的基础性条件。可是，这种平等的交换却催生了不平等的奴隶制度，这是商品与市场后来遭到诅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那些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绝对地好的理论家眼中，商品与市场破

坏了原始公有制，催生了私有制，这是商品与市场的主要罪责之一。

然而，奴隶制取代原始公有制，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请听一听恩格斯的意见。

“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④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评判历史前进与倒退的标准问题：是生产力标准，还是某种人为的先验的所有制标准！？

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商品与市场催生了奴隶制度，但以人身占有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奴隶制度与平等的商品、市场制度在本质上仍然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奴隶制度中，商品与市场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压抑，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商品与市场制度要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人必须成为自由人。

社会分工、商品交换与市场制度是相互依存、三位一体的。没有社会分工，就谈不上商品交换与市场制度；反过来，商品交换与

市场制度又进一步推动和制约着社会分工。

经济史实表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按照政治经济学伟大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看法,“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⑤而分工又受到交换能力和市场发展程度的制约,“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⑥

按照当代新制度学者的观点,市场交易也有成本。市场越不发达,交易成本就越高,人们自给自足的倾向就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不发展。而要降低交易成本,推进社会分工,就必须使市场制度更完善、更发展。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这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许多小的氏族被逐步溶合成一个较大的民族,许多小的民族又逐步溶合成一个更大的民族,民族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氏族、民族的溶合与经济的溶合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经济溶合往往是氏族、民族溶合的先导。

氏族、民族的经济溶合与经济联系是从商品的交换、市场的交易开始的,市场是各氏族、民族经济溶合和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商品与市场制度本质上是开放性、社会性的,它把个别生产与社会需要联结在一起,把分散的氏族经济、民族经济联结在一起,把私人劳动、个别劳动变成了社会劳动。

《易经·系辞下》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市场把分散的氏族部落经济通过交易而联结在一起。

《圣经·以西给希伯来预言》第二十七章生动地描绘了公元前

1000 多年时太尔的市场盛况,仅以太尔停泊的船只看,船板是塞尼尔的枞树,船桅是黎巴嫩的柏香木,船桨是巴山的橡树,象牙凳来自几丁姆群岛,帆布是埃及的刺绣细亚麻布。繁荣的市场使太尔成为一个“串联各岛商人”的城市,市场把分散的民族经济结合在一起。

通过市场交易而发展的经济依存和经济联系,对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溶合,是比武力征服更为强大和持久的力量。通过市场交易而可获得的丰富且价格低廉的商品,市场交易带来的明显比较利益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⑦

维尔·罗杰斯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曾经有三件伟大的发明:火、轮子以及中央银行。”^⑧轮子的发明,推动了交通的革命,而撬动交通革命的杠杆,则是商品交换和市场。

商品交换与市场离不开交通,市场的发展也必然要促进交通的发展。我国古代神农氏时期,“日中为市”,市场所复盖的区域以半天徒步所及为限,市场的狭小与交通的不便紧密相联。相传黄帝时,“剡木为舟,刻木为楫”,舟、楫开辟了水上交通。引致交通史上这一革命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为了便利不同地区氏族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易,它无疑拓宽了市场所复盖的空间区域。随后,又“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陆路交通跟随水路交通之后也得以发展。据传,黄帝时期商品交换与市场交易已有了一定的规模,物物交换已进入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在市场发育的进程中,水运似乎比陆运更为发达。亚当·斯密认为,“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⑨同理,繁荣的市场也往往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